

# 古代中国如何应对周边国家侵扰

通常采用“羁縻”政策

通常意义上，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惠。羁縻政策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直接设立州县的边远地区、内属之国，也可包括敌国和“绝域之国”，承认或册封其当地政权，后者对中央政权有朝贡义务，亦即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中央政权，而其余一切事务中央政权均不予干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中央王朝笼络周边政权，从而维系周边安定，保证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显然，这种所谓“统治”是十分脆弱的，既无军队驻扎，也无直属关系，口头或纸面上一句称臣纳贡，实际上则是天高皇帝远。历史上，缅甸、越南乃至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都曾经在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带骚扰不已，并最终引发了中央王朝的征伐行为。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低头认错，中央王朝便会既往不咎。这些国家则继续以朝贡之名获得前者更多更实在的回赠。

清朝痛击缅甸换取安宁

明朝年间，中国对缅甸常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通过保持缅甸内部各个割据势力的平衡，利用其间矛盾维系边界稳定和中央权威。但当16世纪东吁统一缅甸后，这一政策失去意义，东吁缅甸开始不断袭扰明朝云南边境。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拒不与东吁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并一直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东吁王朝末期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清朝纳贡称臣，乾隆十五




## 皇帝反贪为何输多赢少

一个王朝的初期，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有的还用铁腕肃贪。几十年后，原先严厉的反贪法令变得宽大，原先峻厉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贪腐得以急遽蔓延。到了王朝的后期，十官九贪，积重难返，纵然皇帝想反贪，只怕也是有此心而无此力了。

**宋太祖也有反贪无力的时候**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鉴于前朝法网过密，执法严苛，于是制定了“折杖法”，“以递减流、徒、杖、答之刑”。别的罪犯有望获得宋太祖宽恩，而犯了贪赃之罪的官吏，却要被判死刑，且要在街头处决，决不赦免。宋太祖反贪可谓坚决果断，但他对心腹大臣赵普却网开一面。

宋太祖明知赵普是巨贪，却既不追究，也不训斥，原因就在于，宋太祖治理国家，少不了赵普的辅佐。

但这样一来，就等于划了反贪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可以反贪；超过这个界限，反贪反到赵普等宋太祖的心腹大臣，则不被允许。这便造成了官员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大官大贪，官照做，皇帝的恩宠不减；小官小贪，弄得不好，脑袋搬家。这岂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明孝宗反贪却无彻查的决心**

明孝宗弘治年间，太监李广以旁门左道被孝宗宠信，一时权倾朝野，后他因得罪了当朝皇太后而自杀。之后，孝宗听说李广家中藏有“奇方秘书”，便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知道，原来他宠爱的太监李广是个大贪，于是下令没收李广的财产。中央监察机关的官员们要求按李广受贿账本，对行贿者逐一追究。账本上有名的那些人，一个个惶恐不安，各自星夜找皇帝的外戚求救，最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但那些向李广行贿的人的名字，“一一盛传于朝野。”然而，朝廷上下，尽管都知道谁谁向李广行过贿，但就是按下不查。

明孝宗是明朝第七代皇帝，《明史》说除明太祖、明成祖外，明朝皇帝“可称者”还有三人，孝宗便是其中之一。他登基之初，就下过一道严厉的圣旨：朝廷政事，祖宗有老规矩，今后中央各衙门必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官员们不得接受贿赂，为人为说，违反者，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都要送特务机构东厂或锦衣卫严刑审讯。但就连这样一位皇帝，对于一名贪腐的太监，也下不了彻查的决心。也许他担心牵涉官员太多，影响朝廷形象，影响官兵队伍稳定；也许众多皇亲国戚为行贿者求情，不得不给皇亲国戚们面子。所以，反贪，不能手软，不能拖延。如反贪力度不够，则不足以震慑贪官。而拖延则意味着腐败之癌迅速扩散。若病入骨髓，便是想反也反不了。

（摘自《人民论坛》5月（下）王春南/文）

</